



# 危機與對策

## 中國社會衝突觀察

于建嶸



# 危機與對策

## 中國社會衝突觀察



于建嶸

#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書名 危機與對策——中國社會衝突觀察

作者 于建嶸

責任編輯 顏純鈞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0年11月/ 初版

---

ISBN : 978-988-219-337-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0

# 目 錄

|                                          |     |
|------------------------------------------|-----|
| 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br>——在北京律師協會的演講 ·····          | 5   |
| 村民的自治與共治 ·····                           | 60  |
| 為基督教家庭教會脫敏 ·····                         | 92  |
| 中國的政治現實和我的夢想 ·····                       | 114 |
| 中國的底層社會<br>——我的研究和立場 ·····               | 143 |
| 中國農民工的維權狀況及前途 ·····                      | 176 |
| 中國的信訪制度改革與憲政建設 ·····                     | 195 |
| 中國的騷亂事件與管治危機 ·····                       | 218 |
| 當代中國工人的「以理維權」 ·····                      | 244 |
| 農地問題：中國農民維權的焦點 ·····                     | 258 |
| 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活動與政治 ·····                     | 273 |
| 終結革命：背棄承諾抑或重構價值<br>——20世紀中國工農運動的遺產 ····· | 288 |
| 中國農村的衝突和治理 ·····                         | 327 |



# 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

——在北京律師協會的演講

時間：2009年12月26日

地點：北京財政部禮堂

## 觀點提要

- 很多迹象表明，當前中國的社會形勢越來越嚴峻，其中最直接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群體性事件的頻繁發生。根據我的研究，群體性事件大致可以分為維權、洩憤和騷亂三種類型，而維權活動又可以分為農民、工人和市民這三部份。
- 維權活動的主要特點是有比較明確的利益訴求，洩憤事件則沒有明確的利益訴求，主要是發洩心中的怨恨。騷亂和洩憤最關鍵的區別在於騷亂主要針對無關人員，即無辜的人。
- 目前，中國雖然發生了一系列社會衝突事件，但這些事件並不能從根本上動搖中國政治統治的統一性和社會管治的有效性，中國社會總體上是穩定的。不過，這種穩

定是與中國的威權體制密切相關的剛性穩定，蘊含着潛在的風險。

- 一個真正和諧穩定的社會，要有明確的權利；要有權威的司法制度；要有真正的代議制度；要有開放的媒體。
- 當矛盾加深，社會壓力越來越大，大家都感到無路可走的時候，各種社會力量就要開始尋找底線了。那麼，甚麼是中國當前社會穩定的底線呢？在我看來，應該促成憲法的真正落實，讓憲法成為中國社會穩定的底線，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主持人：**各位，近年來由於社會資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平，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以及腐敗氾濫現象等等，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衝突加劇，仇官、仇富心理嚴重。因為環境污染、土地徵用、房屋拆遷、企業改制、違法行政、司法不公等侵犯公民基本權利，引起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諸如甕安事件、甘肅隴南事件等等，大規模的惡性事件也越來越多，已經影響到了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律師代理的涉及群體性法律事務也有很多。那麼當前我國群體性事件有些甚麼特徵，律師如何辦理這些群體性事件的案件？辦理這些群體性事件案件過程中應當注意些甚麼問題？如何進行自我保護，避免法律風險？今天我們十分榮幸地請到了于建嶸教授為我們做題為「社會衝突與律師建設性作用」的演講。大家歡迎！

于教授係法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

《底層政治》、《中國工人階級狀況》、《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和《中國勞動教養制度批判》等等，于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社會問題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詣。他將以當前我國社會群體性事件的特徵與對策為核心，今天與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成果和高見，相信于教授的演講一定能給大家很多啟發，引發深思，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和收穫。下面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于老師為我們講課。

**于建嶸：**大家上午好！我實際上是1987年的律師，做了八年，現在在社科院農村所工作，所以沒有再從事律師的業務。我今天講的題目叫「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原來想叫「讓憲法成為社會穩定的底線」，但有些人一見「憲法」兩字就敏感，所以就不想在題目裏出現憲法兩個字。為甚麼要講這個題目呢？就是想對當前的中國社會到底發生了甚麼、還會發生甚麼、我們可以做甚麼這幾個問題進行一個簡單的梳理。

中國社會已進入矛盾衝突的多發期，中國將會走向何方？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長期以來，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最基本的觀點，就是認為中國社會會發生很大的社會動盪。這個觀點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大家議論比較多。比如，海外中國分析家伍凡先生就認為：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造成大批企業倒閉，工人失業，潮水般的農民工返鄉，以及全國範圍的維權抗暴運動、地下教會運動、退伍軍人維權抗暴運動等等因素將決定，2009年中國將出現全國大動盪。2009年2月1日，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刊登〈在危機打擊下，猛烈的動盪將搖晃中國〉一文稱，「出口萎縮令中國上千萬的人失

去工作」、「引爆社會不穩定浪潮」、「銀行破產、失業以及社會動盪正在蔓延」。國內的學者對此也多有論述。中國著名作家沙葉新先生在接受香港《蘋果日報》採訪時指出：近年內地社會矛盾衝突不斷，各地維權活動此起彼伏，「從農村失地農民、城市拆遷戶抗議，到各地出租車司機集體罷駛，現在又有教師集體罷課，抗議規模越來越大，波及面越來越廣。我很擔心，而且有預感，這些行動在來年將更成氣候，中國很可能會出現大動盪！」等等。

對這個問題中央領導也多有擔憂。中央綜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中央綜治辦主任陳冀平在年初的時候也認為：2009年將是各類社會矛盾碰頭疊加的一年。我國社會穩定形勢處於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基本狀況不會變，而在當前形勢下，新的社會矛盾將不斷產生，原有的一些社會矛盾也可能隨之凸顯，並呈現出經濟領域的新矛盾與老矛盾、經濟領域的矛盾與其他領域的矛盾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局面。

但我的看法不完全是這樣的。年初的時候我曾經在《財經》雜誌發表一篇文章。在我看來，中國社會雖然會發生很多問題，但是總體上是穩定的，2009年應該不會發生社會動盪。也就是說，社會動盪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由於中國社會的剛性穩定結構，社會動盪離真正發生還有一定的距離。

不過最近我訪問了中國一批退下來的部級幹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個核心智囊部門的核心人物。他有這麼一段講話，他說：「我們現在許多問題，是制度性的。腐敗問題

之嚴重，特別是軍隊中的腐敗，貧富差距這麼大，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又得不到保護，老百姓不信任政府，失了民心。如果經濟上發生了問題，情況就會大變。而且，現在經濟上出現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就以房價為例，現在的房價高得不是人住的了。這樣的經濟如何有可能不發生問題呢？一定會發生的。如果經濟上發生了問題，老百姓就會去搶銀行，去衝擊你的政府，然後就會發生甚麼呢？就是整個社會的動盪。中國發生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可能性的，甚至可以說只是時間問題。」我還訪問了一些重要的在職領導幹部，他們也有這個結論，說中國的社會動盪是不可避免的。那麼真的會這樣嗎？我自己也感覺到越來越迷惑，所以魏大忠律師和魏汝久律師請我到這裏和大家交流的時候，講實話我有點底氣不足。這個問題我在國內外講了一年，包括在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和中央黨校，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沒有底氣。為甚麼？因為我訪問了這些人之後，他們的判斷在影響我的認識。我在想他們為甚麼認為中國一定會發生動盪呢？到底應該怎麼辦？前兩天有一批律師到我家裏，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假如一些主要的精英人物都認為中國會發生動盪，我們這些法律人士應怎麼辦？我們當時的結論是憲法是維持中國社會穩定的底線。所以我今天臨時把這個題目改成了「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想和大家討論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問題？為甚麼要尋找社會穩定的底線，這個底線又是甚麼？

今天是26號，再過四天這一年就過去了。但是越來越多的迹象表明，目前的形勢越來越緊張，越來越嚴重。這種社

會形勢最直接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群體性事件。事實上，從1993年到2006年，群體性事件從8,709起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包括今年都超過了90,000起。最關鍵的是特大群體性事件的增加。這些增加的確在動搖執政者對國家的判斷。表面上看我們有很好的樓建起來了，有很好的公路開通了，大家好像感覺到鶯歌燕舞，但實際上這些事情在動搖執政者及整個社會民衆對中國前途的判斷。

我首先要和大家探討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這幾年我曾經對中國群體性事件做過簡單的分類，大約可以分為維權、洩憤和騷亂這三種類型，而維權活動又可以分為農民、工人和市民這三部份。

對於當代中國農民問題，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這本書是根據我在湖南的調查寫的，講的是2004年以前的中國農村。我想回答一個問題，當時中國農村發生了甚麼。根據調查，我得出一個結論，當時中國農村的社會衝突主要是抗稅費鬥爭。對這個時期農民的集體行動，我提出了「以法抗爭」這個解釋框架。這個觀點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我寫的兩篇文章，〈當代農民維權抗爭活動的一個解釋框架〉（《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2期）和〈90年代以來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活動〉，（《21世紀》香港中文大學，2004年第12期）。（放PPT）這是我2002年在湖南農村調查時拍的照片，當地政府要求「堅決打擊抗糧、抗稅、抗合理上交的不法分子」。抗糧，大家知道指不交公糧；抗稅，指不交國稅或者地稅；抗合理上交就是抗費，不交各種名目的稅外收費。後

兩者我們簡稱為稅費問題。（放PPT）這是2002年我在江西農村拍的片子，地方政府在宣傳「皇糧國稅不可抗拒」。（放PPT）這是2002年12月22號，我在湖南衡陽縣農村調查的時候，拍了這幅照片。它說的是甚麼呢？這批農民在組織農會。當年毛澤東組織第一個農民協會的地方，離這兒不遠。這兒出了一個人物叫夏明翰，說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夏明翰，還有後來人。這個地方的農民都會告訴你這句話，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某某某，還有後來人。我在這個地方曾經問他們，你們為甚麼要組織農會？他們告訴我，組織農會就是要和地方的貪官污吏抗爭到底。當時我非常震撼，回來之後我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標題叫做〈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在報告中我提出來，天下可憂在民窮，天下可畏在民怨。少數農民從對基層幹部施政行為的怨恨，發展到對體制的不滿情緒，應該是一個十分清楚的政治信號。如果執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這個信號，將產生的政治後果則是可以預測的。也就是說，這麼多農民因地方的貪官污吏而產生民怨的時候，你這個政權要思考它的風險在甚麼地方。報告出來之後，社科院以要報的形式報給了中央。後來中央有一個很重要的舉措，在2004年的3月5號，溫家寶在兩會期間宣告取消農業稅。宣佈之時，所有的人大代表站起來向他鼓掌。

農業稅費的取消實際上與當時的湖南農民的抗稅活動很有關係。（放PPT）這個人叫彭榮俊，他是當時組織農會的領袖。2008年12月6號，他被評為改革開放三十年十大農民英雄。評語是這樣說的，「彭榮俊通過宣讀中央文件的方式發動群

衆，成立了一個由13名『減負代表』（代表全責任區13個村）的『代表隊伍』，開始組織上訪、宣講中央文件、直接與鎮村幹部談判等一系列的維權抗爭活動，對最終取消農業稅起到過積極作用」。我今天想講一句話，中國的一些政策改變並不一定是由於中央政治理念的改變，不是由於領導人的愛民或者親民，而主要是來自於社會壓力。當時中央分析，這種社會壓力下，徵收農業稅所獲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還不如放棄農業稅，從政治上、經濟上考量之後，中央才做出了這麼個決定。

農業稅取消時，很多人認為中國的農村問題解決了。我今天告訴你，問題並沒有解決，只是情況發生了變化。（放PPT）

這是中央某媒體的一個數據統計。每天都有許多人打電話到焦點訪談去投訴，它專門有人記錄這些投訴。我和它有個協議，它讓我進入所謂的絕密系統，進去就會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告甚麼人，打甚麼官司，發生了甚麼問題；我每個月要給它提供兩份報告，告訴它最近中國的焦點問題是甚麼。根據對這個電話系統資料的觀察，從2004年6月開始，土地問題成為了中國農村的焦點問題。因此，我們在2004年9月2號的《南方週末》上發表了一個調查報告，說土地問題已經成為了中國的焦點問題。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土地問題與農民抗稅有甚麼不一樣。

首先，雙方當事人發生了變化。目前農村土地糾紛較之稅費爭議來說，在雙方當事人方面有着較大的變化：從控告方而言，雖然村民聯名仍然是最為主要的形式，但村級組織已成為

了重要的控告方。在一些實際性的衝突中，村民的男女老少齊上陣的情況也經常發生，這與稅費爭議時主要以抗爭精英為主有明確的不同。從被告方來說，市縣成為被告方的比例較高。在農民稅費爭議中，被告方主要集中在鄉村兩級組織，其中鄉鎮政府是最主要的被告，市縣很少成為被告的主體。特別是，在目前的土地糾紛中，一些房地產經營公司和開發區成為了被告方，這在稅費爭議時期是沒有過的。（放PPT）這是2004年9月四川漢源瀑布溝水電站施工現場抗議的民衆，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後省委書記被包圍起來的一起事件。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想去看一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他沒想到農民把他認出來了。最後動用了武警。有一名武警（張志明）被打死，多名武警負傷。大家再認真看一看這幅圖片，就會發現這是一些甚麼人？老年人，老年婦女。我在調查中國農民抗稅的時候很少發現婦女參加的。在湖南衡陽就發現了一個婦女參加了，原因是由於她的父親被打死了，她家只有這一個閨女，所以她來抗稅。而農民土地問題，你會發現大量的婦女和老年婦女走到了第一線。甚麼原因？兩個。我曾經去訪問過她們，她們告訴我，第一，我們是老年人，我們要為子孫萬代留下一塊土地；第二，地方官員不敢對我們老人採取措施。所以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她們是軟實力。你不要看這是一些老年人，地方政府的確怕她們，它不怕年輕人站到這裏，拖你一下沒關係，這個老人一拖可能到醫院去了。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說，這是「軟實力」。

其次，地域也發生了變化。農民抗稅的時候主要在湖

南、湖北、江西、四川這些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目前農村土地糾紛最集中的地區是沿海較發達地區。其中以浙江、山東、江蘇、河北、廣東最為突出。這些地區爭議的主要是非法或強制性徵地，農民控告的對象主要是市、縣政府。在中部地區的安徽、河南、黑龍江等地區所表現出來的問題主要是對農民土地承包權的侵犯，控告的對象主要是鄉鎮及村級組織。這些年，廣東是個重災區。（放PPT）你們看，2005年12月廣東汕尾市發生了軍警與維權農民的惡性事件，導致三位東洲坑村村民死亡。

再次，抗爭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在農民的稅費爭議中，上訪、宣傳和阻收是最主要的抗爭方式，而到了農民的土地糾紛，到縣市政府部門門口或被徵土地上靜坐、遊行示威甚至高速公路、鐵路上靜坐。也就是說，農民抗稅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你找不到人，見不到人，而農民土地問題他主動地走到你面前。（放PPT）這是四川省自貢市紅旗鄉的農民默默地站在被徵用的土地上，維權的農民經常以此種方式進行抗爭。據悉，90年代以來，四川省自貢市政府以建高新開發區為名，徵用了紅旗鄉農民的土地15,000多畝，價值50多億元，造成30,000農民喪失生計。

最後，抗爭的激烈程度和外力介入情況也發生了變化。在農民抗稅維權時，由於中央有明文禁止使用警力，地方政府在使用警察鎮壓農民維權代表要承擔政策和農民反抗的雙重風險，所以除個別事件外，很少在稅費問題發生一定規模的警農衝突。而目前的土地維權抗爭活動中，由於利益巨大，雙方爭

議無法協調，地方政府動用規模警力對待失地維權的農民已是常事。很多時候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謂社會重點工程等為名大量使用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因此，農民土地抗爭的衝突程度變得相對激烈。（放PPT）這是2006年福建莆田土地事件的警民衝突現場。

此外，農民抗稅費和反對徵地時外力介入程度也不一樣。農民抗稅費時，很少有外力介入的；但是農民土地問題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師和黑社會兩種勢力。大批律師介入，我分析了兩個原因。第一，這些年來，社會的公民教育、維權意識、公共知識分子、公共律師大量產生，他們為了政治的或社會影響等目的介入到了農民土地問題。第二，農民抗稅費時，你去代理官司收入很少；而農民土地問題，可能會獲得很大的經濟利益。我不認為經濟利益是錯誤的，但現實是很多律師介入農民土地問題，是由於土地問題可能產生比較大的律師費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抗爭的農民一方，也就經常通過各種渠道向社會求助。再加上知識精英主要是法律人士的介入，有許多事件就會離開土地糾紛本身而成為政治事件。河北省唐山市20,000多名移民因土地補償款而聯名罷免市委書記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一案、秦皇島市10,000多名移民也因同樣的理由罷免市領導人的動議案等都是在北京某民辦機構策劃下而發生的。

另一方面，黑社會介入中國農民土地問題也很嚴重，開發商甚至政府有時也會借助於黑社會對付維權農民。根據我的觀察，今天中國百分之八、九十大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會的

背景。黑社會勢力現在甚麼事都敢幹，甚至真的開槍打農民。最嚴重的要數2005年6月的河北定州事件。定州市委書記動用黑社會搶奪農民的土地，現在判刑了。我曾經去訪問他，我說你做一個共產黨的市委書記不容易，你可能要請客送禮、開後門，不知道想了多少辦法才做一個市委書記，你怎麼會動用黑社會去搶奪農民的土地呢？這個市委書記這麼回答我：他說我很冤，我並沒有組織黑社會，沒讓黑社會去。只是這個公司說你政府不能解決，我試着辦，行不行？我當時答了他一句話，「你去做吧。我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真的會動用黑社會真槍實彈去打農民。」

2008年3月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芮捷銳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來要訪問我。我們社科院很緊張，因為一般情況，一個國家的大使不會來訪問人。單位做了一個預案，和你們律師一樣的開會，組織一幫人猜猜他可能問的問題、我應該怎麼回答。最後他來了，我們所有想到的問題他都沒有問，而只問了三個問題，其中一個是說2007年在你們中國有三個地方的農民宣告土地私有<sup>①</sup>，假如有一天，中國的農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麼辦？我當時一聽頭就大了，因為我們的預案裏面沒有這個問題。我回答他，根據我們的調查，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還沒有這個觀念。我沒有告訴他一個內幕，這些都是我們一個非律師的法律工作者策劃的，這個人很多人都認識，其實他策劃

---

① 2007年江蘇宜興市省莊村250戶農民宣告擁有宅基地所有權。2007年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76個行政村約7萬回遷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2007年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南崗村等72村4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